

儒家文学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引 言

儒学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从孔子、孟子、荀子到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等历代儒家代表人物怀抱“仁以为己任”的精神创建与发展儒学,使儒学如生命的洪流,二千五百多年来生生不息地流淌着,虽历经艰难,几经曲折,但代有高潮、蔚成奇观,传播中国、辐射东亚、流向全球、泽惠万方。

儒学在传播与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形态并产生着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儒学统摄哲学、伦理、政治、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关怀与实践的范围之内,这不仅是古代知识分子(士)安身立命之道,而且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心理结构的形成。

儒学有制度化儒学、社会化儒学、深层化儒学或超越性儒学诸形态,而政治性儒家、民间性儒家与精神性儒家则为儒家的不同层次。不同层次与形态的儒学各有其互异的思想内涵,不可一概而论,精神性儒家主要是指孔子、孟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创建与发展的儒学大传统,是儒家智慧的集中体现。牟宗三在《生命的学问》中指出:“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

体,莫若儒。”价值的领域,是真、善、美的领域,儒家的智慧或者说精神性儒家主要体现于求真、明善、审美的精神价值创造活动之中,并形成不同于西方智慧的文化性格或民族特征。

儒家的智慧以关注生命把握生命为特色,“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就在如何体验、领悟、调护、安顿生命这一点上,儒家开辟出精神领域:求真、明善与审美的价值世界。儒家的文学观念、艺术观念及相应的文艺理论,是其关注、体验、把握生命的智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具体表现。文学艺术是生命的体验,是儒家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核心精神。“充实之为美”,(《孟子》)诚如宗白华所阐发的:“文艺境界的广大,和人生同其广大;它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这是多么丰富、充实!孟子曰:‘充实之为美。’这话当作如是观。”(《美学散步》)以体验、把握生命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为人生而艺术、融艺术于人生、成就人生艺术化或艺术化的人生,这是儒家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灵魂。

翻开近百年中国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美学史》、《中国艺术史》等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从孔子、孟子、荀子诸先秦儒家开始至今,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确如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再序中所说的“自幼嗜文学”,至老“酷嗜不衰”。文学的创作或研究,是他们生命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代表人物中有的还是《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记叙的一流诗人散文家或文学批评家,而历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不是“一代儒宗”,就是倾向于儒家的人物,特别是以体验、把握生命为主旨的儒家文论、诗论对中国文学、中

国文学理论的文论性格或民族特征的形成,产生的影响极为巨大深远。

儒家文学观念是一种大文学观,儒家美学观念是一种大美学观。宋濂在《文原》中说:“昔者游、夏以文学名,谓观其会通而酌其损益之宜而已,非专指辞翰之文也。”钱穆在《中国现代学术论衡》中论及中国文学时也说:“今日国人之称文学,则一依西方成规,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无之。此虽一名称之微,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今日国人竟称中国文学,乃亦以文章为文学,则其厌弃旧文学岂不并孔门游夏文学一科而亦加厌弃,此又不可不辨。”儒家的文论、诗论自有不同于近、现代由西方传入的纯文学观念的特色,儒家的大文学观、大美学观与西方近现代纯文学观、纯美学观各具自身的文化性格,不可同日而语矣。

近百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国诗学、中国文学思想、中国文学理论及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领域,有一突出的学术倾向或学术现象,是以西方传入的纯文学观为依据,批判与解构儒家的大文学观与大美学观;而对简单套用西方纯文学来批判、解构表示质疑与反对者,又起而与之争鸣、抗衡,进而对儒家的文论、诗论作新的阐释与重构。纵观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此类学术争鸣一直未中断,且时有高潮。中国现代思想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吴宓、陈寅恪、钱穆、钱基博、宗白华、朱光潜、邓以蛰、梁实秋、成仿吾、李长之、钱钟书、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以及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方东美等,都不同程度介入此类论题的争鸣,各抒己见,形成不同的观点、倾向及流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的精神风貌。

不论是批判与解构、抑或是阐释与重建,都可以证明儒家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并没有“博物馆化”,以生命体验为文学的特质、以为人生而艺术、融艺术于人生,成就人生艺术化的精神为文学理论的灵魂的儒家文论、诗论还活在人们心中。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思想争鸣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儒家的大文学观与大美学观,彰显了蕴涵于其中的文化性格与民族特征。近年来,随着“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减弱,对纯文学观崇拜的情结也被破除,以西方近现代纯文学观念批判解构儒家文论、诗论的研究方法也受到质疑,认为此类研究会遮蔽儒家文论、诗论的文化性格。因此,研究儒家文学理论的现代意义与现代价值,在方法论上应该如荀子所说的从“解蔽”开始。

第一章 儒家大文学观念的现代诠释

一、儒家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文学”这个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但它的涵义和近代从西方传入的 literature(文学)不同,和魏晋以来“文学”独立或自觉的观念确立后也有差别。《论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邢昺《论语疏》释“文学”二字为“文章博学”^①。今人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注释“文学”说:“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皇侃《义疏》引范宁说如此。《后汉书·徐防传》说:防上疏云:‘经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似亦可为证。”^②

古代文献内容丰富、绚丽多彩、范围广泛,其中包括文学类的文献。此处“文学”并非后世的“文章”,主要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典文献,即孔子编定的“六经”。章学诚说:“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

^① 阮元《十三经注疏》,世界书局影印阮刻本,第2498页。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①章学诚又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②对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文章源于六经的观念作了总结。据此《论语·先进》中“文学”这一词,虽与钱钟书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的不同于西方输入的“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但其中亦包含有文学性与艺术性的“诗”与“乐”在内,是一种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近代文学家、学者选择《论语·先进》中“文学”一词翻译西方的 literature,自有其深意。西方的 literature,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它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在 18 世纪以前,literature(文学)往往是广义上使用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文学”(literature)条解释:“用文字写下的作品的总称,常指凭作者的想象写成的诗和散文,可依作者的意图以及写作的完美程度而识别。”《论语·先进》中“文学”的涵义,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

近人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③程千帆注释说:“文学一词,先秦已有。《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墨子·非命篇》:‘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荀、韩诸子书亦有之,而其范围至广,盖一切学术或文化皆属焉。今此所指,则为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其封域异于先秦,而侈于近世抒情美文乃为文学之说。”^④此处所说的“近世抒情美文乃为文学”的“文学”,是指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③ 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 页。

④ 程千帆《文论十笺》,第 3—4 页。

16—18 世纪期间在西方逐渐形成、20 世纪初在中国确定和流行的狭义的文学。现代西方狭义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界定为一种语言性艺术,与《论语·先进》中的“文学”观念,即将文章和学术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文学观是有区别的。程千帆对章太炎《文学总略》中“文学”一词的注释,指明了中国文学原初的含义与近世的含义不同的特点。现代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论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史,虽多采用《论语·先进》“文学”一词,但其内涵已是“依西方成规”^①,属于狭义的文学观念。所以,刘永济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说:“近人章氏太炎,务恢弘文域,考其论刊,一切皆文。颇亦远师舍人,可谓文家至大之域矣。”^②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广义的文学观念或大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虽然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③。钱穆也说“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正式的文学批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关键。因文学独立的观念,至此始确立”^④。萧统《文选序》所说的“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萧绎《金楼子·立言》所说的“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迻合,情灵摇荡”,清代阮元在《文韵说》中说的“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必沉思翰藻,始名之文”,所界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57 页。

②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 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04 页。

④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69 页。

定的“文学”定义太严格了,这种以“辞采”、“文华”、“翰藻”为标准来确定文学性或艺术性的观念,是中国文学史或文学理论史中狭义的文学观念。耐人寻味的是,阮元在《文言说》、《文韵说》中将这种文学观念的奠基者追溯到孔子,说“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①。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罗家伦在《什么是文学?》中重新界定“文学”定义时,认为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太宽,阮元的文学定义太窄^②,征引与参照西方文学观念及文学界说重新界定文学定义,并批评说中国文学不仅与西洋文学有根本的不同,而且违背了文学的原理。确如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所说:“今日国人之称文学,则一依西方成规,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无之。”^③罗家伦与钱穆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分歧,从深层彰显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各自独特的文化性格,而孔子的文学观念所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性格。

《论语·先进》中“文学:子游、子夏”一语所蕴含的文学性或艺术性,及从孔门四科中“文学”与“言语”两科所体现出的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受到现代儒家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或从文本出发,或以西方文学艺术观念为参照,对孔门四科中“文学”与“言语”两科所蕴含的文学性或艺术性作了诠释,在一定意义上赋予孔子所论的“文学”、“言语”现代性品格。

① 阮元《文言说》,道光文选楼本《肇经室三集》卷二。

② 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

③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57页。

二、儒家大文学观念的内涵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释“文学：子游、子夏”一语说：“孔子言诗书礼乐文章，皆与言语政事相通，本章文学特成一科，盖所偏重，乃若与言语政事两科有异。子游、子夏于此最所擅长，不惟子贡、宰我、冉有、季路非其伦，即颜闵、冉伯牛、仲弓视之，殆亦有逊色，故游夏得于三科之外特标文学一目。此可见孔门晚年文胜之风。”^①钱穆此论是有根据的。《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尔。”此两段《论语》文本不仅体现了孔子与孔门弟子立教、为政的宗旨，也充分彰显了孔门诗教、乐教的艺术精神。《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文学”著称的子夏、子游不仅是孔门中博通古典文献的人，而且也是最能体会与传承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的人。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朱彝尊在《文水县卜子祠堂记》中说：“徐防之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周

^①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7页。

予同在《从孔子到孟荀——战国时的儒家派别和儒经传授》中也引徐防之言，肯认“六经”大部分都来自于夏的传授^①。由此可见，钱穆所说的子游、子夏于“文学”“最为擅长”，“孔门晚年文胜之风”是言而有据的。

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专列《略论中国文学》一章，他认为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极有深意。言而文，则行于天下，行于后世，乃谓之文学。何谓文？此涉及艺术问题，故文学亦即是一种艺术，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才能传播流行。钱穆又说中国全部文学尽从“诗三百”来，“诗三百”不仅表现了中国古人的“诗心”或“文心”，也内涵着中国古人的“人心”或“人之性情”。所以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文学观念，核心的精神是“文学即人生”、“文心即人心”，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基于这种文学观念，他强调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文学观念剪裁或曲解孔门文学观念。“今日国人竟称中国文学，乃亦以文章为文学，则其厌弃旧文学岂不并孔门游夏文学一科而亦加厌弃，此又不可不辨”^②。章太炎、刘永济论文学力求“恢弘文域”，侧重于文学的“体类”问题，而钱穆则重在恢复孔子论“文”的精神，强调不应以“文章”限定孔门的文学观念。“文学即人生”，“人生而即文学”，“岂止诗歌辞赋、骈散为文乃始谓之文章乎？孔门四科，游夏文学，亦乃为文章之学，乃称文学，而亦岂诗歌辞赋骈散诸文之始

^①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3页。

^②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57页。

为文学乎?”^①从钱穆的质问中可以体悟出一个道理:儒家文学的特质应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去掘发,儒家文学具有自身的文化性格。

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论及中西哲学时说:“哲学一名词,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无之。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西方哲学思想重在探讨真理,亦不得谓中国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近代国人率以哲学称之,亦不当厚非。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究有其大相异处,是亦不可不辨。”^②在钱穆看来,“哲学”这个词是从西方翻译来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哲学”这个词。中国思想中虽然有与西方哲学相应的部分,而不相应的部分则占有更多的分量。近代学人讲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思想,乃是指中国典籍中一些同古希腊哲学与西方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而言,如先秦“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道学”或“理学”等,这种哲学或中国哲学史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亦不当厚非。但是,中国哲学自有其传统与特质,与西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或概念哲学,自有相异之处。如果以中国思想之实来牵就西方哲学之名,则恐怕容易流于削足适履。例如,中国人言思想主贯通,西方言思想则贵有别。中国人言“人文化成”,西方人实无此观念。西方哲学重客观,不重主观,于此哲学家本身之时代与地区,乃绝不介意。即如康德,其人生平,记载备详,但与其哲学无关。在中国,则读其书贵能知其人,如《论语》、《孟子》是矣。读中国文学亦然,读屈原《离骚》,可知屈原其人。读李杜诗,则知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57页。

②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3页。

李杜其人,读韩柳文,则知韩柳其人。言学术,中国人必先言一共通之大道,而西方人则必先分为各项专门之学,如宗教科学哲学,各可分别独立存在。再如言道与艺,中国古人无论儒道两家,莫不以道为本,以技与艺为末,志道明道行道,是其本。技与艺,皆包涵在道之中。游于一艺,可相分别,会通和合,则皆一道,此可谓是中国哲学,道与技亦相对立而和合为一。而西方人则知有技有艺而不知有道,亦可谓西方人乃认技与艺即是道。西方哲学探求真善美,皆在外,而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则真善美三者同在己之一身一心,无待外求。哲学如此,文学亦如此。钱穆在《略论中国文学》中所论的中西文学相异处,其主导思想与《略论中国哲学》是相通的。诗心、文心即人生、人心,人的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中国文学皆自著者一己之性情发出,或从生命深处性情深处言。中国人生既求文学化,文学亦求人生化。中国人重生命相通,故其文学亦重心性,自内而外。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今必分文学哲学而为二,斯其意义与价值,惟各见其减,不见其增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易通于诗之比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可以体悟钱穆论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相通之理。章太炎、刘永济所论的“恢弘文域”,亦从钱穆持论的“文心即人心”、“文学即人生”来思考,则应包涵文学与哲学打通之问题。故此,若用西方近代以来“纯文学”的成规来衡论孔子、儒家的文学观念,则难以体悟、理解“文学:子游、子夏”一语之真义,也难以阐发孔子、儒家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及现代意义。

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对孔子、儒家的文学观念所作的阐发更为系统,他认为中国人著述有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

国人不尚作论，其思辨别具蹊径，故其撰论亦颇多以诗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鱼，论而近诗。孟子见梁惠王，论而即史。后有撰论，大率视此。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他称此处所说的诗、史，即孔子、儒家所说的诗、书。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则为易教。诗书之教可包礼乐，易则微近于论。木落而潭清，归真而返朴，凡不深于中国之诗与史，将不知中国人之所为论。史籍浩繁，史体恢弘，旁览并世，殆无我匹。中国民族之文学才思，其渗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广。他又指出：诗者，中国文学之主干。诗以抒情为上。盖记事归史，说理归论，诗家园地自在性情。中国文学以诗为主。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凡中国古人善言者，必具诗味。其文亦如诗，惟每句不限字数，句尾不押韵，宜于诵，不宜歌。盖诗乐分而诗体流为散文，故散文亦可谓从诗体演来，其佳者必具诗味。西方文学则以小说戏剧为主。相比较而言，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中国乃诗的人生，西方则为戏剧人生。中国之诗化人生，可称为艺术人生。而西方人生，则仅得称为是戏剧化，不得同称之为是艺术化，在西方真善美必相分立，而中国则真善美同归和合。此是中西双方人生大相歧所在，不得不深味之。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实含艺术人生或诗化人生的精神。道者，人之共同行为，而必当于个人各别之德性。德性则必有情，于是有人与人之同情，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艺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皆属之。游为涵泳。人生大义尽此矣。则中国之道德人生，亦即是艺术人生，正是一诗化人生。读《论语》则如诵一首诗^①。今传《论

^①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138页。

语》，纵不能说其全是文学的，但至少也不是非文学的。中国最古的散文小品，应可远溯自《论语》。一般把《论语》作经书看，认为是圣人之言，不以文学论。然自文学眼光看来，《论语》一书之文学价值实很高。总括言之，钱穆对孔子、孔门弟子及《论语》中孔子与弟子问答对话之言所蕴含的文学性、诗性的阐释，有助于我们体悟、理解孔子、儒家文学观念的真谛。

如果说钱穆对孔门四科中的“文学”一科阐发得尤为精彩的话，徐复观则特别重视“言语”一科。他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不仅表现在音乐方面，对文学也有伟大的启示。孔门四科中的所谓“文学”，乃指古典之学而言。四科中的所谓“言语”则发展而为后来的所谓文学。因为在孔子时代，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主要还是语言而不是后世所谓文学和文章。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是注重语言的艺术性，推广了说，也即是注重文学的艺术性^①。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是《左传》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②的意旨所在。阮元以“文必有韵”、“文必尚偶”来释“言之无文”的“文”，说“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曰文”^③，实为骈文理论的特色。刘勰《文心雕龙》中《情采》、《声律》、《丽辞》诸篇，萧统《文选序》等文中均有论述，声韵、辞藻、对偶、用典等骈文的语言类，是衡量作品“文采”的标准尺度。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有专节驳斥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②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 阮元《文言说》。

阮元之论,其意在“恢弘文域”。徐复观注重孔门四科中“言语”一科,指明“语言的艺术性”问题,当然要考虑阮元与章太炎关于文学观念的论辩,以求阐发孔门“言语”一科发展为后世的“文学”的根由。

徐复观在《〈文心雕龙〉浅论之六》中指出:五经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正如一个大蓄水库,既为众流所归,亦为众流所出,中国文化的基型、基线,是由五经所奠定的。五经的性格,概括地说,是由宗教走向人文主义,由神秘走向合理主义,由天上的空想走向实用主义,中国文学,是以这种文化的基型、基线为背景而逐渐发展的。所以中国文学,弥纶于人伦日用的各个方面,以平正质实为其本色,用彦和(刘勰)的辞汇,即是以“典雅”为其本色。我们应从此一角度,去看源远流长的“古文”运动,但文学本身是含有艺术性的,在某些因素之下,文学发展到以其艺术性为主时,便会脱离文化的基型、基线,而另辟疆宇,楚辞、汉赋的系统,便是这种情形之下,便常会由文化的基型、基线,在某种形式之下发出反省规整的作用^①。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系统地阐发了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并探讨了此种精神对文学的启示,而此篇论文则是研究刘勰《文心雕龙》有关“文之枢纽”问题。他认为刘勰所写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把握住“文之枢纽”,即标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源,因而得以把握中国文学在发展中的统贯与其趋归及其大的规律。为了矫正当时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文弊,提出“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的原则,说“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与“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简言以达旨”、“博文以该

^①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情”等意思是相通的。

徐复观十分重视刘勰站在文学的立场来说明五经的崇高价值所作的《宗经》一文,并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的论释,阐明自己对文与道、文与情、道德性与艺术性的看法,揭示孔子、儒家文学观念的要义。他诠释说:文章出自性灵,而五经则“洞性灵之奥区”,深彻到性灵的深微之地。性灵即是性情,五经所敷陈之义,皆极性情之真,极性情之正(“义既极乎性情”)。性情即是文章的骨髓,所以五经的文章能极文章的骨髓。文章的表现,必须合于艺术性的要求,而五经表现之辞,也非常技巧地(匠)合于其内容的文理,即是其表现也富于艺术性。因此五经之文,乃天地间之至文。一般人不知道从文学上推崇六经,刘勰推崇六经,不仅与经生有同中之异,且亦与后来古文家有同中之异。古文家宗经,多拘陷于道德的一面,刘勰则直追入道德文章所同出的性灵,并注意到五经所表现的艺术性。以此言宗经,对文学而言,始不至于腐,不至于迂,不至于硬将道德与文章,从外面来加以拼凑。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五经为文章的典范,后世各类文章从渊源关系上考论皆出于五经。他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①基于“文能宗经”的原则,刘勰提出了体有六义:一、情深而不诡;二、风清而不杂;三、事信而不诞;四、义贞而不回;五、体约而不芜;六、文丽而不淫;还强调“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

^①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页。